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来源集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17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
與比較文學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CSSCI来源集刊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第 17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主办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
與比較文學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雨时 葛眺翔(特邀)

责任校对:楼 晓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17 / 曹顺庆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7-5614-4251-7

I. 中… II. 曹…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文集②文学理论—文集 IV. G112-53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8900 号

书名 中外文化与文论 (17)

主 编	曹顺庆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251-7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5 mm×240 mm
印 张	12.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方法论与变异学

1	主持人语	曹顺庆
3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曹顺庆
14	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和方法	刘介民
31	论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的发展	吴家荣 刘 萍
49	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	刘 颖
61	现代性影响下“晚明叙事”的矛盾与修饰策略	谭 佳

文学意义论比较研究

74	主持人语	吴兴明
76	“意象”和“意境”：中国古代诗论的意义论的取向	吴兴明
90	语义杂多：新批评的文学意义论	支 宇
108	语言之逻各斯：话语	匡 宇
116	“样式齐全，榫合完美”——评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	卢迎伏

中西诗学平行研究

- | | | |
|-----|--------------------------------------|-----|
| 128 | 主持人语 | 阎 嘉 |
| 130 | 直观与解脱：在尼采与克罗齐之间的朱光潜美学 | 肖 鹰 |
| 139 | 他者的视角：西方中国文论研究——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 邹 涛 |
| 145 | “诗学” | 刘延超 |

东方文化比较研究

- | | | |
|-----|----------------------------|-----|
| 151 | 主持人语 | 徐新建 |
| 153 | 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 | 尹锡南 |
| 169 | 中朝文论关系比较 | 陈 丕 |
| 179 | 中日诗话的影响与比较——十至十三世纪中日诗话关系探析 | 邱明丰 |

访谈与介绍

- | | | |
|-----|----------------|-----|
| 189 | 格林布拉特与欧美当代文化诗学 | 邱 岚 |
| 198 | 编后记 | |

方法论与变异学

曹顺庆

主持人语

中国比较文学已日益走向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综观世界,审视自身,在反思与超越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充实和完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在学科教育中推进理论的革新与方法的提升是这组专栏文章的主题,也是当今比较文学学科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层面的重要问题。

变异学理论是当今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新的创生点,也是当前国内学界关注所在。《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的深度阐述正是为解学界之惑。文章从综观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入手,探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认为在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缺乏对文学交流中变异现象的研究的情况下,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正是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启了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阶段。在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阶段,异质性可比性问题,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其在学科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方面的调整与革新将会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推动与促进作用。《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和方法》就曹顺庆提出的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继续探讨。文章结合对“跨文明”、“变异学”、“失语症”的分析,从研究方向和具体方法两个方面探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择取原则和具体途径。作者同时强调在实际研究中,要根据研究的课题的性质需要选择方法,并坚持对研究方向的创新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的诉求。文章细致分析,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种种问题、争议详加辨析,鞭辟入里。《论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的发展》从学科教育的角度切入,在对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的开创期、

繁荣期、创新期三个发展阶段梳理与反思中,辨析其间彰显的特性与存在的问题,意在以此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把脉。教材是学术理论获得体制化认可的重要环节,学科发展与理论革新效用的实现皆有系于此,此文实证性的考析与探讨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专栏中一并收录了两篇以微观层面切入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以“风骨”的英译为例,从语际翻译中意义的创新和重塑,观照汉语词汇为异质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形成文化交流中新的话语秩序的过程。《现代性影响下“晚明叙事”的矛盾与修饰策略》以现代学界对晚明文艺思潮的叙事与评价中出现的内部矛盾为例,剖析了不同叙事策略如何修饰与遮蔽这些逻辑矛盾,以期梳理文学史的建构、现代思想的转型问题提供线索与反思空间。

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

曹顺庆（西南交大艺术传播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迄今为止，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坚持的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第二阶段是美国学派坚持的平行研究；第三阶段是中国学者倡导的跨越异质文明的变异研究。本文拟从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深度入手，探讨变异学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现有学科理论的缺憾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法国学派是以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为其基本特征的，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是法国学派最根本的特征。法国学派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①要使比较文学研究落到实处，就必须加强实证性的科学精神。梵·第根也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而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声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②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③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5页。

② [法]马·法·基亚著：《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前言第1页。

③ [法]卡雷：《比较文学》出版序言，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法国学派的学科定位是既追求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又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国家文学体系之间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建立起的是以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三大理论为主的研究大厦。流传学研究的是一个文学现象在另外的文学体系中获得的影响与传播的状态;媒介学研究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影响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渊源学是在起点不明确的情况下所做的研究,是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可见,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是实证“关系”,而不是“比较”,属于文学外部的研究。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二阶段是美国学派。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实质上就是丢弃“比较”,而只谈“关系”。美国学派恢复了曾一度被法国学派丢弃的“比较”,打破了法国学派强调的事实联系自我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艺术、宗教、历史和哲学)之间进行比较。它关注的是文学性,即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与规律,所以它是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它用文学的美学价值取代了法国学派倡导的文学实证性的影响关系,突出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是既重视跨国也重视跨学科的特点。

目前,几乎所有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都以为,有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满的大厦。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研究结果证明: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即使有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我们仍然不能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首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求不同中的同,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比较文学的基本事实和客观规律。因为法国学派所强调的以“国际文学关系”为核心的“影响研究”,其变异性要大于类同性。即便是在美国学派强调的以“类同性”为共同规律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变异现象。

我们承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同源性”、“类同性”是“可比性”的基本立足点,但我们要郑重提出:变异性、差异性同样具有可比性,而且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立足于差异性这个基本点上而提出来的。变异学探讨的是完全差异的对象是否存在可比性的问题。变异学的根本理论认识是:异质性也是可以比较的。同源中包含了变异,因

为同源的文学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会产生变异,这就是异质性的体现。事实上,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求“异”的问题。然而“异”是两个学派都没有注意的重要问题。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没有从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对其加以考虑和总结。

二、影响研究的特点与面临的困惑

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就是研究国际文学关系史,坚持实证性的科学精神正是法国学派的突出个性,但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也同时包含变异的问题。因为当一国文学传到另一国时,它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

实际上,国际文学关系的两大支柱是实证与变异,也就是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与变异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做如下分类:诗歌的实证关系研究、小说的实证关系研究、形象学的实证关系研究。对于变异研究,我们也可以做如下分类:翻译的变异研究、语言的变异研究、接受学的变异研究等等。

在法国学派的研究中,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只突出了实证性的一面,即只注重研究存在着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而忽略变异性的一面。法国学派不但回避谈论审美判断与平行比较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着的变异。这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两大缺憾。其中,放弃“比较”,忽略文学审美的缺憾,被美国学派所弥补,而变异性的缺憾至今仍未解决。

法国学派提出国际文学关系时,一直强调实证性和科学性,但是在具体从事影响研究时却遭遇了很多无法实证的困难。比如,运用实证方法就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而且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经提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这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的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有能够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表面注重的是有事实关系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其实早已突破实证性的研究。卡雷于1947年出版了他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此书由巴黎布瓦文出版社1947年出版。他的学生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设置了“人们眼中的异国”一章,借以专门讨论形象学问题,这是最早的一部对形象学研究进行确认的概论性著作。卡雷与基亚的努力,使得法国学派打开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那就是他们直接进入了对“形象学”的研究,但是他们依然不承认“形象学”是非实证性的。可

事实上,法国学派确实是在运用实证的、科学的方法从事着非实证、非科学的对象性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是不属于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比较文学范畴的。

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形象学应该属于变异学研究范畴。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①,以形象学研究的“词汇”、“套语”为例,中国人将美国人称之为“美国佬”,将日本人称之为“日本鬼子”,这些就是中国人对美国人、日本人的集体想象的体现。正因为它是一种集体幻象,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集体想象,所以产生变异是必然的。变异学中的形象学对想象的强调,从“再现式想象”上升到了“创造性想象”层面,也就是说他者的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已经经历了一个生产与制作的过程,是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在注视方的自我文化观念下发生的变异的过程。

可见,在文学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的因素的作用下,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会发生变异。如果说影响研究根本目标是求“同”,那么变异学研究探求的基本特征就是“异”。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

三、平行研究的特点与面临的困惑

目前,很多比较文学概论教材都认为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发明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学派恢复了平行研究。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法国学派否定了平行研究,认为“平行”不是比较文学。凡是不涉及“关系”之处,都不是比较文学。“比较”的方法被后来的美国学派所恢复。

第二,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的原因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讲究审美性的。法国学派仅仅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特征。这直接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非审美性。文学研究中必然伴随着审美性因素和心理因素,而这是实证性关系研究所无法证明的。这个缺憾恰恰被美国学派弥补了。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一方面比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同;另一方面是将文学与诸如艺术、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作比较。当然比较的两者必须具备可比性,从中总结

^① 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美国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有比较诗学、类型学、主题学、文体学和跨学科研究。主题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处理,它研究的范畴包括母题研究、情境研究和意象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平行研究中包含主题学,影响研究中也包含主题学,这种现象体现了平行研究中也必然包含变异关系研究。

第一次在比较文学史上提出“主题学”术语的是法国比较文学家哈利·列文。他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的重要建树是“主题学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法国学者保尔·梅克尔于1929年至1937年间编辑了一套主题学丛书。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单独开辟了“主题学”一章,弗朗索瓦·约斯特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导论》中详细地论述了主题学。

到底主题学是属于影响研究,还是属于平行研究。事实上,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既含有影响研究注重文本外部关系的因素,也含有平行研究注重文本内部审美性的因素。所以,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文体学等研究内容,也是属于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

美国学派并非完全排斥影响研究,它批判的是对文学进行纯粹的实证考察,主张应该将实证研究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何况,两种研究范式在某些内容上是呈交叉状态的,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为何在美国学派的主将韦斯坦因和雷马克的著作中,都有对影响研究的阐述。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只讲文学关系,美国学派恢复了比较,表面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似乎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已经出现了困惑,使得体系出现了不完美之处。具体体现在:有人提倡比较文学无边论,又有人提倡比较文学应该有边界。比如,韦勒克等人就提出什么都可以用于比较。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等都是注重研究审美性的,比较文学就是探讨全人类文学的共同审美性。它可以跨越很多边界,包括文明的边界,从而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以至于韦勒克认为可以将比较文学边界无限扩展,甚至可以直接将比较文学改称为“文学研究”。因为这些都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探讨人类共同的文学规律。正如韦勒克主张的“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去“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①可见,他的

^① 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和165页。

认识已经偏离了学科边界，成了比较文学无边论。与此相反，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有学科边界，而且韦斯坦因也认为跨文明的比较是不存在的，不应该将比较文学的边界扩大。对此，韦斯坦因批评道：“我以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在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① 韦斯坦因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研究的对象会过于庞杂，何况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太大，无法进行追求类同性的平行比较。显然，无论是韦勒克还是韦斯坦因，他们的主张虽有差异，但都在比较文学的“求同”之上进行研究，这证明了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的。

从“求同”的思想意识出发，不管是韦勒克还是韦斯坦因，都没有认识到比较文学的变异性实质。美国比较文学界两种对立的观点反而揭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面临的一个危机，而这种危机美国学者却恰恰没有看到。他们只论争或说明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学可比或不可比的问题，却并没有说明种种理由。

美国学者之间的论战，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有：第一，他们走不出比较文学“求同”的思维模式；第二，欧美学界的某些前沿理论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就是从差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他阐述的道理是西方人研究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这个运用学理方式加以研究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导致的结果，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很明显，萨义德并没有从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来深刻地认识这点，而更多的是从话语霸权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他认为，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决定了西方处处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东方。他没有认识到东西方文化是存在异质性的，也就是说双方既有可通约性，又有不可通约性。这是西方以萨义德为核心的学者们，在对东西方文明差异性问题上的认识。

以上例子说明，美国学者在运用平行研究看待问题时，往往会忽略异质性的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面临着危机。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存在着重大缺憾，即缺乏变异学理论的指导。

一般情况下，比较文学学者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即平行研究中也存在着变异问题。因为，我们在通常情况下所讲的变异是影响研究中的变异。但是，当我们运用平行研究时，两个毫不相关的对象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相汇了，双

^①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不过，韦斯坦因后来的观点有所改变，已经开始看到东西方文学比较的必要性。

方的变异因子从交汇处产生了,这就是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不同的文明在碰撞中产生变异,这种变异涉及了文明差异的交集。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根本之处是体现在双方的交汇中,是文明的异质性交汇导致了不同文明的变异。

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突出之处体现在话语变异上。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原本都有一套独立的文学话语体系。比如,以浪漫主义为例。湖畔派诗人提倡的浪漫主义,注重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味的情感。”^① 华兹华斯在《写于早春》这首诗中这样写道:“……穿过簇簇樱草,在树阴下,/长春花已把它的花环编成;/我有个信念:认为每一朵花/都在欢享空气的清新……”^② 柯勒律治在《查木尼山谷日出颂》中赞叹到:“……啊,高峻的布朗峰!/阿芙河、阿尔维伦河在你山麓下/咆哮不停;但你,最威严的形体!/高耸在你沉静的松海当中,/多么沉静啊!在你的周围和上空/……”^③ 这两首诗赞美了充满欢乐的大自然,以及诗人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感受与爱怜之情。从这两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浪漫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和诗人的主观想象力。若以此浪漫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的古代诗歌基本上都可归入浪漫主义范畴之内,因为中国的古诗都是重情的,都是“发乎情”^④ 的。正如白居易对诗的定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⑤ 但事实上,中国诗并不是浪漫主义可以完全概括的。所以说,被冠之以“浪漫主义”的所谓中国浪漫主义,绝不是西方提倡的浪漫主义。一种事物从一个国土传播到了另一个国土,它必然会生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变异。也就是说,西方话语进入到中国,虽然其主要架构仍然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但在中国国土上,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变异,已不再完全是西方的了。比如,“禅宗”已不是印度佛教,而是印度话语与中国话语结合后发生变异的结果。

对文学作品而言,“理论”就是一个“话语”,文学理论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换句话说,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出的基本规则,再用这套规则来指导文学创作。关于“话语变异”,我们可以引进萨义德“理论旅行”的观

①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前言》第2版。中译本参阅《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② 华兹华斯等著,李昌陟译:《英国浪漫主义五大家诗选》,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③ 同上,第79页。

④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第一卷),《毛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⑤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卷),白居易:《与元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点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一种文学理论话语从一个国家“旅行”到了另一个国家以后,会产生变异。当代的“理论旅行”基本上是从西方到东方,东方基本上是在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西方的理论话语到了中国以后,产生了两方面的话语变异:一方面,在知识谱系上,西方文论几乎整个地取代了中国文论。现当代的中国学术与文学研究几乎都是照搬西方的文学和理论,导致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新时期,中国极力地引进、介绍西方的文学和理论。海德格尔、卡夫卡、哈贝马斯等西方文学家、理论家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学术很难有自己的创新。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处于“失语”的状态了。我们没有站在自己的话语方式的基点上对西方文论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而是全盘照搬西方文论。另外一方面,西方理论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①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西方的文论话语必须与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相结合,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规则的立场上选择性地、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才能真正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现状。要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首先应注意文学理论的“他国化”。由于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翻译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某些中国色彩。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必然会面对一个吸收、选择、过滤、误读的再创造过程。其次,要使西方文论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就需要西方文论自身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学术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相结合,加快中国文论自身的创造力。^②

西方文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文论的整体“失语”。自从我在1995年《东方丛刊》的《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提出“失语症”的问题后,就引发了学界长达十年的论争。对“失语症”的认识,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我们需要重申一下“失语症”的内涵。它有两点内涵:其一,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失落;其二,汉语文化现象本身的现代转型。事实上,“失语”也属于变异的范畴。“失语”是一种现代性变异,即中国理论自身的变异。“失语症”是中国文论追寻现代性的一种症状体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古代

① 关于这两个问题可参阅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5)。曹顺庆、李夫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视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理论与创作》,2004(4)。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② 同上①。

文论的现代化努力。古代传统文论在现代性文论面前失去言说自我意义的途径，所以古代文论呈现出了在西方现代性文论中的被动转化和在自我传统文论基础上的积极建构。第二是现当代文学艺术整体否定了古代文论的意义建构方式，而整体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范式。现当代文学艺术所呈现出的这一趋势就是现代性的变异。第三是以西方文学范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这种解读方式造成了对古代文论真实意义的曲解。第四是全社会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多重否定。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语言的变革。中国古代文论素有“言不尽意”的话语言说方式，但是自从20世纪初语言发生变革以来，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人们在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接触中逐渐淡忘了自身的话语模式，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经典文论的品读渐趋陌生。

另外一种话语变异是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出现的“激活”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在变异中被“激活”后，会产生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这种“激活”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和承继。首先，它要求我们全面反思过去对传统文化的误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其次，从中国文化特征入手领悟本土传统文化典籍的精神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最后，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中国文论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来说当今天的学术问题，展现中国文论自身的魅力，这正是话语言说的创造性的体现。^①

可见，中国文论话语要实现现代性重建，就要在坚守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言说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和融会西方文论的精髓，才不会让西方文论话语成为中国文论意义建构的方式，达到本土与他者的良好结合，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比较文学话语变异最典型的个案，就是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在整个当代中国，学者们都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即用西方文学理论（或是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理论产生了变异。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西方理论改变了中国文学。比如，用浪漫主义解释《诗经》，解释李白、屈原等；运用现实主义解释杜甫、白居易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中国文学产生了变异。其二，西方理论在与中国文学的交汇中也发生了变异。比如，我们在运用西方的浪漫主义阐释中国诗人李白、屈原时，西方的浪漫主义理论也发生了变异。在进入中国之前，西方的浪漫主义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讲述的浪漫主义为准，强调诗歌表达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这在前面已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① 李清良：《话语建设与文化精神的承继》，《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

而中国在讲述浪漫主义时则更突出它的理想、夸张等方面的内容。可见，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二者在碰撞中都产生了变异。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都是在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作品。它既使中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变异，也使西方的理论产生了变异。中国文学理论自身产生的现代性变异包含了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其中积极意义是：变异成为两种异质文明“杂交”的前提。

当代学者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认为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我们认为，西方文论确实有自己力所能及之处，但也有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处。前一种认识体现了西方文论的普世性，后一种认识体现了它的不可通约性。但是，“阐发法”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中西文明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正如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提到的：“对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之间不同的信仰、假定、偏见和思考方式，给予适当考虑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寻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点和性质以及批评的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不应该再谈论‘文学’（literature），而只谈分立的‘各种文学’（literatures）；不谈‘批评’（criticism），而只谈‘各种批评’（criticisms）。”^① 负责翻译此书的杜国清这样评论：“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个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②

可见，“阐发法”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差异性，并且主动地、有意识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种自觉的异质文明之间的互相阐发。它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作品，同时用中国文学作品来检验、校正西方理论。“阐发法”成为中国当代变异学跨文明研究的第一个突破，也是跨文明研究从自觉的、异质角度出发的突破口。

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就是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催生出来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结果。文明冲突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表现形态，也是跨文明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异质性是跨文明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变异性在没有跨异质的文明中也是存在的，在跨文明研究中得以进一步突显出来（限于篇幅，此不赘述）。所以，在“求同”思维下从事跨文明研究，是会面临诸多困难的，而变异才

① [美] 刘若愚著：《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版，第209页和封底。

② 同上。